

斯芬克斯之谜再现：论后人类时代的主体与伦理困境

周素素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随着新技术革命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大，身体的“缺席”式在场与身份的游牧式流动跳出理论范畴成为物质现实。传统主体的边界日渐模糊，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陷入更复杂的伦理困境。在上述问题背景下，本文将首先着眼于主体性概念，溯源西方文明中有关主体伦理的建构和解构，并对后人类时代的主体观作简要阐释；第二部分结合科幻文学文本和艺术文本中人与非人之间产生的伦理危机作具体分析；最后对后人类时代主体重构及科学选择的相关问题作出延伸思考。

关键词：后人类；主体性；伦理困境；科学选择

中图分类号：I0-02；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832-9317 (2022) 01-0022-05

本文链接：<https://www.oc-press.com/HA-01-022.html>

引言

哈拉维宣称，“迄至 20 世纪晚期，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都是奇美拉（Chimera），是理论化虚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物，简而言之，我们是赛博格。”（Haraway 151）奇美拉，这个来自希腊神话中长着羊头、狮身、蛇尾的怪物，成了赛博格形象的最佳譬喻。而这样的杂合体，令人联想到另一个来自希腊神话中的怪兽——斯芬克斯。她是狮身人面、长有双翼的女妖，传说赫拉派她蹲守在前往忒拜城的十字路口，向过往的行人问一个谜语：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晚上用三条腿走路的是什么东西？在俄狄浦斯正确地说出了谜底“人”之后，斯芬克斯却因羞惭而跳崖自尽。人兽一体的斯芬克斯具有人的头部象征着思想与智慧，而兽身却代表着原始和欲望。她提出的问题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核心是对自身身份和人类本质的追问。自然选择使人与兽产生了相异的生理形式，但人真正能把自己同兽区别开来是通过伦理选择实现的。而在后人类时代，“人类则要经历或正在经历一个科学选择的阶段，使人变成科学的伦理人”（聂珍钊 240）。随着信息网络、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等科技的深入，我们仍保有“头脑和思想”，却在虚实交替的幻象之间实现了身份的流动和身体的缺席，最终成为复生的斯芬克斯。如今，斯芬克斯的谜面不再是关于“几条腿”的狡黠设问，但本质上仍与主体性和伦理身份密切相关。在后人类时代，面临变动不居的主体危机，科学选择显得尤为重要。

一、主体与主体性的概念回溯

主体，译自英文“subject”，语源来自拉丁文“subjectum”，原意为“置于……之下”，动词引申为“使

隶属；征服”之意。由其内涵可见，主体自始都不仅仅代表着独立个体，它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便与外界紧密相连，实质上包含一种控制和隶属的权力形式。在古希腊时代，先贤们从各个角度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以逻辑论证自己的学说，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主体实践观；进入中世纪，宗教统治了世俗世界，上帝主宰着精神世界，人的实践活动主要为神服务；到了现代，人文主义摧毁了神学虚无缥缈的高墙，将人从神权的软禁中解放，确立并巩固了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宣言率先宣告了“主体”的诞生，证明了思维主体“自主、自足”的存在。笛卡尔的哲学思想虽然没有完全脱离神学的范畴，但却为现代哲学体系的发展确立了以人为主体的伦理取向。18 世纪，康德超验式的“人为自然立法”则将人的主体地位推向顶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他将人确立为认识主体，由此感知自身及周围客体。康德倡导的主体是“认识主体”更是“道德主体”，“实践理性”为“道德主体”提供有效的行为准则，并先验地存在于纯粹理性之中。黑格尔在康德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主体的概念，认为人的主体核心在于“绝对精神”，“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乃是绝对即精神这句话所要表达的观念”（黑格尔 15）。从笛卡尔到黑格尔，权力逐渐从“神”手中易主，人确立了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打造了属于“理性存在”的“主体王国”，而自主自足、外向扩张的主体观成了西方哲学乃至西方社会的思想共识。因此，曼斯菲尔德在书中将西方现代称为“主体时代”（The Era of Subject）。

当黑格尔将主体理论演绎到极致，“主体王国”

的崩塌与瓦解也随之开始。随着二战落幕,学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清算才刚刚开始。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哲学家们认为,在工具理性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下,主体的物化和异化倾向成为现代社会的最大弊病;而以海德格尔和福柯为代表的一系列学者则将矛头狠狠指向传统的主体哲学。海德格尔反对传统哲学中的主客二元论,认为胡塞尔在现象学中提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依然没有摆脱先验性主体的藩篱,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此在”(Dasein)来取代主体,将目光投向主体间的共在性。

在尼采喊出“上帝已死”之后,福柯又大胆地宣布:“人之死”,他所指的“人”是在现代规训系统下被动思考和行动的“主体”,其本质是在历史中建构的,与权力的奴役息息相关。他发展了一套谱系学的方法体系,在考古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引入微观权力分析,对主体性、形而上学与历史的中立立场展开彻底的解构。自此,统治数千年的“主体王国”大厦将倾。而战后迅速发展的各项科学技术不断更新人文学界的常识与思考,新阶段的哲学基础与主题伦理呼之欲出。

二、百家争鸣的后人类主体建构

到了20世纪后期,后人文主义者们继承了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思想遗产,并与技术科学研究中的前沿理论(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以及生物基因等)融合,对传统人文主义中的“人类中心论”发起新一轮冲击与挑战。福柯的理论彻底抛弃了主体,动摇了人文主义的根基,但无主体的认识论却将人文研究置于荒芜之境。后人文主义学者们力图在主体世界的废墟中构建出适应后人类时代的“非人”主体性,并在边界趋于融合的框架中寻找一种能为新时代背书的哲学。

在《赛博格宣言》中,哈拉维试图构建一种基于后现代叙事的多元异质融合的主体,巧妙借用当时在技术科学领域充满想象而又接近现实的“赛博格”概念,并赋予其颠覆性的哲学意义,成为新的身份政治神话。

“赛博格式控制论的有机体,是机器与生物体的杂交体,既是虚构也是社会现实中的生物,”更是“一个后性别世界的生物”(Haraway 149-150)。带有明显杂糅特征的赛博格成为一种深刻的隐喻,进一步动摇自笛卡尔以来的二元论体系,并将矛头对准以二元对立为根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以及自然与非自然界限的崩塌最终宣告固有结构的瓦解。21世纪初,哈拉维发表了新的《伴侣物种宣言》(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来远离主流的后人类主义思潮。她认为在后人类主义群体中有一种倾向,即把后人类单纯地理解为人与科技的深度耦合后发展的新物种。在这个意义层面的赛博格根本没有摆脱父权制资本主义,伦理身份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甚至沦为

统治信息学的傀儡。“伴侣物种”是赛博格在生命上的实践,“物种”暗示了人与动物无差别的分类方式,而“伴侣”不仅从空间意义上显示了一种共生关系,更流露出情感层面的分享与支持,突破传统伦理观重新建构了跨物种间的共情想象。

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从控制论的脉络出发,力求厘清具身(Embodiment)和离身(Disembodiment)的理论动力和变化历程。她明确后人类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一个信息的独立实体”(海勒5),并且后人类主体本身的边界仍在不断坍塌与重建。海勒认为在有关后人类的议题中,仅仅研究科学文本是远远不够的,“文学文本常常揭示科学作品所不能触及的复杂文化、社会议题,紧密地呼应着观念转变和技术创新”(32)。所以她将大量文学文本引入叙述,由作品中人工智能与人的对立引发出关于控制论和后人类的思考。在现实语境与文学想象中,海勒向我们展示了人机关系的种种可能并探讨其间产生的伦理道德博弈。

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是哲学后人文主义的代表,她赞同反人文主义学者们对经典人文主义主体的批判,但对其历史虚无的倾向持绝对的否定态度。她认为自己的后人文主义立场“建立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的目的论和政治学的基础上,并走得更远”(布拉伊多蒂54)。因为她指出后人类的真实状况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后人文主义与后人类中心主义的集合。前者侧重于对‘人’作为万物尺度的批判,后者则批判物种等级和人类中心的例外主义,”(Posthuman Knowledge 22)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她主张的后人类主体仍处于一种尚未完成的状态,游离于多种身份并在不断跨越边界、横向融合。她借用德勒兹的“褶子—游牧”的理论来表达无限延展的开放主体概念,并将其命名为“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布拉伊多蒂一再强调游牧主体“反对将自己置于社会编码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中,”(Nomadic Subjects 5)她关注的更多是后人类在现实情境中承载的伦理意义,并坚持后人类伦理应建立在主体的具身性基础上,因为后政治永远只是乌托邦式的后人类想象。

三、后人类时代的主体样态与伦理困境

后人类时代的降临并非危言耸听,而关于后人类主体性的讨论也并非只是哲学家们的逻辑练习。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全面深入,智能制造、万物互联、人工智能等技术愿景正逐渐变成真实的社会图景,人类主体性的转变也成为不容置喙的现实。正如皮埃罗·斯加鲁菲(Piero Scaruffi)在《智能的本质》中所言:“我们属于后人类,与技术共存,依赖技术,并由技

术指引”。(斯加鲁菲 140)在以技术为核心的后人类框架下,人类将与非人产生更多错综复杂的联系,而人类自身也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在数字化的非人进程中演变,由身份重构引发的伦理混乱使伦理危机一触即发。

(一) 人与非人的伦理博弈

杰西卡·里斯金(Jessica Riskin)在《永不停歇的时钟》(The Restless Clock)里特别提到,从17世纪至今,人们对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论断产生了刻板印象的误解。“笛卡尔将动物描述成一种自动装置,并不是要把它们看成无生命的东西,”相反,这个观点恰恰表明“动物是有生命的,动物是活生生的机器,”甚至“动物和人体在本质上都是机械的”(里斯金 115)。机械的运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生命体的工作原理,这不是将生命降格为机械装置,反而是将冰冷的机器提升到生命的高度。笛卡尔对动物和机器的思考印证了人与非人之间不是天然的主客对立关系,围绕于此的激烈辩论持续了几个世纪。

1818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问世,不仅标志着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的诞生,更开创了文学文本在科幻想象中探讨人一非人关系的先河。小说的副标题是“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与哈桑在一百多年后将后人类比作普罗米修斯产生一种奇妙的呼应:后人类神话的降临并非不期而至,人类面临的伦理危机早已有迹可循。弗兰克斯坦创造的怪物“诞生于1816年仲夏的一场梦魇”,他由不同死尸的肢体拼凑而成,雷电赋予了它生命。但从他“复活”的那一刻起,弗兰克斯坦却对他成功创造的生命避之不及。他的组织都来源于人体,可是没有人将其看作同一物种,尽管他和人类有着一样的生存与发展需求,甚至学会了爱与关怀。然而,他的善良并没有得到人类的理解和接纳,人与似人的对抗叙事由此展开。

随着世界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人工合成生命体的发展远远超过雪莱在19世纪对于人体拼贴的构思。受各种颠覆性科技的驱动,现当代的科幻小说家们参照现实为蓝本,以前瞻的眼光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在文学世界中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人与非人关系。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中,仿生人在外表和心智上与人类别无二致,甚至比“特障人”更像人类,区别二者的有效方法是维特甘测试,即基于图灵测试的移情测试。赏金猎人德卡德在执行追捕新型仿生人的任务中,他发现仿生人不再是辅佐人类的机器,他们有自己的思考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与仿生人的对弈间,德卡德多次被他们玩弄于股掌,而接连的杀戮甚至让他对他们

产生了怜悯与感情。与此同时,人类在地球的生活却单调得可怕,体验人造的默瑟、花重金饲养真实动物成为生活信仰的全部来源。在这样一个末日世界,人和仿生人都在不断追问自己的伦理身份,“说到底,移情能力模糊了捕食者和被猎者、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界限,”(迪克 21)所以移情能力真的是鉴别真伪的关键吗?抑或只是人类中心主义对“他者”一如既往的傲慢与偏见?而《金羊毛》(Golden Fleece)中AI杰森和人类亚伦的对峙,《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中克隆人们悲惨的命运也对自负的人类发出了相似的诘问:人与非人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定义?高贵的灵魂是否只是人类为了凸显自身主体性的虚伪托词?由此,人与非人产生的伦理混乱成为科幻作品中最重要的一条伦理线,多种复杂的伦理结中展开主体间互训的叙事与反叙事。

在科技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不仅只有作家刻画人与非人之间复杂的身份伦理,其他领域的文艺工作者也将目光投向不断变化的人机关系,尤其关心在机器处于上位后,那些被技术裹挟的人们所处的伦理困境。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当代艺术家之一,曹斐“运用影像、戏剧、虚拟现实技术和装置等多元媒介,以超现实的表现方法反映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以及社会疾速发展对个体生活的影响。”曹斐出生于改革前沿的广州,这座城市纷繁的文化肌理为她多元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原色。在资本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双重加速下,珠三角地区一度成为全球劳动力最密集的制造中心,而曹斐对全球化进程中那些隐匿于工厂的“年轻的‘手和脚’”(王洪喆 10)难以忘怀。2006年,她的影像装置《谁的乌托邦》(Whose Utopia)采用虚构+纪录片的形式,将镜头聚焦于佛山西门子灯泡厂的产业工人们。他们在车床间跳起孔雀舞,抱着吉他演奏,更多时候却不得不面对冰冷的机器、沉重的剥削和无望的生活。曹斐用一种凄美的镜头语言给产业流水线上机器般的劳动力重新赋予人性色彩,克制而深刻地对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环境进行道德批判,试图在伦理混乱中恢复属于人的伦理秩序。随着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深入发展、产业进一步升级转型,“这些有名姓的手脚即将以更快的速度被弃置,成为无人工厂的匿名前史”。2018年,曹斐又将镜头移向京东的自动化物流仓“亚洲一号”,同样采用虚构+记录的方式,创作了多频录像装置《亚洲一号》(Asian One)。不同于前者,《亚》的镜头氛围充斥着未来感,冷漠而孤寂。影像中男女主角是偌大的智能仓库中仅有的人类,他们的工作伙伴只有一位AI机器人。男女工人在简单重复的工厂生活中彼此接近、渐生情愫,但机器人如幽灵般的存在却使三

“人”间的关系变得复杂且微妙。在中国智能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亚洲一号”的落成无疑已抽象为一个产业符号，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宏大叙事的标志性注脚。

从《乌托邦》到《亚洲一号》，曹斐的作品成了中国十年来快速崛起的一个隐喻——从世界的生产后台成为展示舞台；背后变化的是机器发达程度，不变的却是人不断趋于机器化的伦理危机。利奥塔（Lyotard）曾用“非人”（Inhuman）来描述科学技术对人性造成异化后而产生的现代人状态，他认为非理性的“非人”与技术性的“非人”相抗衡，人类才能更好地发挥能动性。但在现实的科技洪流中，人不断被技术纳入自身的“座架”（Gestell）被技术操控，“非人”与理性人之间早已失去明确的界限。

（二）数字主体的伦理悖论

赛博空间（Cyberspace）一词源于“控制论”（Cybernetics）和空间（Space）的结合，最早出现于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科幻小说《整垮铬罗米》（Burning Chrome），而后在《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广为人知。吉布森笔下的赛博空间是一种交感幻象，人类通过神经系统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连通来进入这个非三维的人造空间。在“高科技，低生活”（High-tech, Low Life）的赛博朋克世界中，计算机网络把全球的人、机器和信息源都连接在一起，物质世界的数码化成就了庞大而纯粹的信息王国。《神经漫游者》成了赛博时代预言式的前奏，而信息技术的革命和虚拟技术的突破将赛博空间变成了现实。人类通过新媒介接入互联网，二进制架构的虚拟空间和使用者的数字化主体形成一种身体缺席的“在场”，打破了梅洛-庞蒂所坚持的身体观——身体不再是“朝向世界存在的‘锚定点’”（宁晓萌 73）。借助数字化技术，“人可以越来越多地把自己转换成其他的超越自我的形态，”（麦克卢汉 93）身体的不在场和数字化的全面覆盖使人类摆脱物理时空的限制成为可能。“离身性”的主体带来了全新的感知体验，而“具身性”的媒介回潮又增强了人类与虚拟空间的互动性，人类从“观念赛博格”发展为“功能赛博格”甚至克拉克（Andy Clark）认为，我们已经变成“天生电子人”（Nature-Born Cyborg）。

数字技术和信息系统正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将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应用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中。我们随身携带手机、佩戴智能手表，时刻与赛博空间保持连接。每一秒钟，这些智能设备不仅自动跟随着我们的数码足迹，更在数据空间不断更新我们的物理坐标，并实时监测着我们的身体状态。人与电子设备的配合最终对物质化的身体构成一种无形的管控闭环。它和环形监狱一样，象征着一种潜在的

规训力量，甚至更强大：不仅监管时间不存在人为因素的空缺，更重要的是，在这套逻辑中似乎不存在传统的权利上级，因为惩罚的执行者和承受者都变成后人主体本身。而福柯的“生命政治”论在后人类时代依然具有启示意义，正如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写道，“福柯的生命政治是赛博政治这块开放领域的一个微弱征兆”。（Haraway 151）当“深度数据化”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城市信息系统的完善和大数据主义的盛行逐渐催生出“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的新模式，面向人口的“生命治理”效率得到极大提升。赛博政治意味着生命政治与技术政治的紧密结合，疫情当下的健康码即是最好例证。“健康码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有力地强化了共同体的‘免疫’能力，”（吴冠军 117）而共同免疫体边界确立的背后隐含了公民对自由和隐私权的无条件让渡。而另一个伦理问题是，施行健康码管控的两年以来，因没有健康码而无法进入公共场所的新闻屡见不鲜。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反映出后人类社会因“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产生的伦理问题，更显示出 zoē 和 bios 转化为数字生命后带来的“余数生命”困境。

除此以外，赛博空间中的数字霸权通过控制数字主体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主体的情绪感知和思维立场，甚至对“数字主体”进行新一轮隐蔽的生活化剥削。早在 21 世纪伊始，意大利学者提兹安娜·特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就洞见了互联网经济化的发展趋势，她从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出发，创造性地使用“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来描述数字主体在赛博空间的虚拟劳动。她一针见血地指出，“网络用户组成了被资本剥削的无偿‘网奴’”（Terranova 35）。被数字化进程遗忘的少数人类成为被现代生活排除在外的“余数生命”，而完成数字化的主流人类群体不仅失去了物质性身体，更在娱乐化和生活化的场景中义务劳动，并同时“贡献”出真正的思考能力。“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体，早已幻化为先哲们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托给后人类的一场辉煌而冗长的旧梦，最终和所有人类文化一样，被二进制编码后永久储存在计算机里。

结语：在后人类时代复生的斯芬克斯

后人类时代，我们似乎都成了复生的斯芬克斯，在人与非人的融合间不断发问，我们何以为人？振聋发聩的回声来自人类灵魂中仍然萦绕着的传统人文主义幽灵，它使我们对不断变换中的身份感到困惑。人与非人之间本不存在高低等级，人类或许应该摒弃陈旧的主客体思维，尊重理解和运用非人智能不仅能帮助人类更好地在后人类时代立足，客观上也实现了人类自身的开拓。“人机结合，知行合一，虚实一体，”

(米歇尔 29) 如此一来, 维纳所期盼的“人有人的用处”将不再是自由人本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现代人文主义中“他者”神话破除后, 人类社会内部的“逻各斯中心”也岌岌可危, 以二元对立为基础、崇尚征服的欲望主体将成为历史。

然而, 当我们力图将“人类中心主义”的恶灵逐出人文主义的范畴时, 同时也要呼唤一种基于正确科学选择的新人文主义。在这个由科技来定义“谁配称为人”的世界, 树立道德价值、保有人文关怀甚至比以往更重要。巨大的“数字鸿沟”背后是人类伦理环境的失序, 人与科技的矛盾本质上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新型表征, 在现阶段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更隐蔽的剥削。在人工智能时代, “专业人员更应关注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的合法、合规与合情问题,” 而作为人文学科研究者, 我们可以和海勒一样将文学文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融合多学科思维, 探讨重建后人类伦理秩序的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 [1] Braidotti & Rosi. *Nomadic Subjects: Embodiment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Theory*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 Braidotti & Rosi. *Posthuman Knowled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 [3] Haraway & Donna.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4] Terranova. Tiziana.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J]. *Social Text*. 2 (2000): 33-58.
- [5] 菲利普·迪克.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 许东华译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
- [6]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贺麟, 王玖兴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7] 杰西卡·里斯金. 永不停歇的时钟: 机器、生命动能与现代科学的形成. 王丹, 朱丛译 [M]. 上海: 中信出版集团, 2020.
- [8] 凯瑟琳·海勒.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刘宇清译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9] 罗西·布拉伊多蒂. 后人类. 宋根成译 [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
- [10]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周宪, 许钧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 [11] 梅拉妮·米歇尔. AI3.0. 王飞跃等译 [M]. 成都: 四川科技出版社, 2021.
- [12] 聂珍钊. 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13] 宁晓萌. 表达与存在: 梅洛-庞蒂现象学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14] 皮埃罗·斯加鲁菲. 智能的本质: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64个大问题. 任莉, 张建宁译 [M]. 北京: 中国工信出版社集团, 2017.
- [15] 王洪喆. 纠缠的时间 [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1.
- [16] 王洪喆. 曹斐: 时代舞台 [M].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21.
- [17] 吴冠军. 健康码、数字人与余数生命——技术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的反思 [J]. 探索与争鸣, 2020 (9): 115-159.

The Riddle of Sphinx Re-rose: On the Subject and Ethical Predicament in the Era of Posthuman

Zhou Susu

Abstract: As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continues to expand in depth and breadth, the “absent” presence of the body and the nomadic mobility of identities are becoming a material reality beyond the theoretical realm.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subjects are increasingly blurred, and humans are caught in a more complex ethical dilemma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above issues, this paper will first focus on the concept of subjectivity, trac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the ethics of the subject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briefly explain the view of the subject in the post-human era; The second part provides a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ethical crisis that arises between humans and non-humans in the context of science ficti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texts; In the last part, this paper offers extended reflections on issues related to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scientific selection in the post-human era.

Key words: post-human; subjectivity; ethical predicament; scientific selection